

議員不是爛仔

周彤

港事講場

林鄭月娥出任行政長官後，致力和諧和做實事，本港政治氣氛轉向和緩，行政立法關係得以改善。然而，正當大家都舒一口氣的時候，伴隨《逃犯條例》的修訂提上議程，立法會又出現亂象。反對派議員橫蠻無理、斯文喪盡，一副爛仔的態勢，令人不齒，可嘆又可悲！

莫誤把謾罵當雄辯

就在5月9日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乘機發難，指責林鄭月娥「打破兩地防火牆」云云。就此，特區政府其實已一再申明，修訂《逃犯條例》對於香港有足夠的保障，足以維護「一國兩制」，特區政府亦已對於移交的罪行有所規限，同時保證不移交政治犯，故此，根本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反對派不斷提出質疑，所持論點來來去去都是那些，特區政府早已給予圓滿有說服力的回應，他們卻充耳不聞，本來就是存心從中作梗，意圖將有關議題政治化，與特區政府對着幹，作為參政議政的立法會議員，這樣做本身就不

具建設性。尤有甚者，胡志偉還進行人身攻擊，指斥林鄭月娥「有黨性、有奴性、無血性、無人性」，形容林鄭月娥為香港帶來的破壞「超過董建華，動過梁振英」云云。這些語句都是帶情緒的謾罵，有失理性議政的宗旨。

議事堂上，不同觀點針鋒相對，詞鋒犀利，本來無妨，但是，現今香港的議事堂，有人卻誤把謾罵當作雄辯，暗自沾沾自喜，殊不知已醜態百出。我們罕見議員以溫和的語氣，睿智的警言，直擊要點，卻常聽到潑婦罵街式的言語充斥議事堂，尊貴的議員都尊貴到哪裏去了？代議士應有的涵養卓識統統都不見，怎不令人感慨？

胡志偉須知羞自省

可嘆的是，上述這種情況已是司空見慣，故此，到此為止，胡志偉的行為還沒有什麼足以令人驚訝的地方，甚至，他竟怒罵林鄭月娥「唔好講大話」，分明語帶譏諷，以致被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逐出議事堂，也還不是大吃驚，因為，反對派議員早已視被逐出會場如家常便飯，當作搶鏡出風頭的手段，一點也沒有羞

恥感。可是再接下來，當胡志偉離開議事堂時，一路不斷謾罵，竟吐出「你唔死都有用啦八婆」這樣的話來，就真是太過唐突不知羞了。

罵人「八婆」是極為粗鄙的話，是一副市井之徒拌嘴時的語調，怎出得大雅之堂，而且還是出自民主黨主席之口？抑或普通一位男士，即或是私人場合，為表示尊重，也不會隨便罵一位女士「八婆」，這是基本的禮貌。更何況是身份尊貴如胡志偉，更何況是在嚴肅的議事堂？代議士再沒有風度，也未見如此不堪，胡志偉這次可以說是斯文掃地，也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不要以為這是小事，事實上，議事堂風氣的敗壞，正是由這些不當的言語和行為積累而成，一次又一次踐踏底線，一次比一次過分，最終就造成不可收拾。民主黨在反對派中算是走溫和路線，並不如「長毛」、毓民，也不是激進的自決、「公投」派，他們的黨主席尚且有如此表現，其餘就更不敢想像了，難道議員都要變成「爛仔」嗎？

希望經此事後，胡志偉能夠帶頭自省，不要再犯，否則，就是議事堂的不幸、市民的不幸了！

胡志偉黔驢技窮

黃熾華

效力和國與國之間務實、正確、光明正大的舉措。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間沒有行之有效的逃犯引渡條例，使殺人犯、詐騙犯逍遙法外；現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正是及時，當可有效堵塞法律漏洞。

香港基本法和2014年中央發布的「白皮書」清楚闡明：「一國」是前提、是原則；香港實行「兩制」，是在「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由中央授權的。修訂《逃犯條例》，讓逃來香港的罪犯引渡回內地，只會保障兩地的治安，又何來干擾「一國兩制」？至於有人鼓吹「港人港審」、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其實類近「治外法權」，在實施上會遇上不少問題，故不宜採納。

胡志偉罵林鄭月娥「有黨性、有奴性、無血性、無人性」？查胡志偉的民主黨及其同夥斷絕與中聯辦溝通、拒絕宴會；聽命於外國反華勢力的意旨，在「反中亂港」中落力當馬前卒，美、英一旦有令反對香港特區修訂《逃犯條例》，就俯首聽從，這又是怎樣的奴性？

胡志偉罵林鄭月娥「八婆」，這是十分粗鄙的用詞，粵語喻多管閒事、愛說非的女人或「長舌婦」。這種罵人的話，放肆無理。莫非自身中了佛教所言之「八邪」咒語：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使、邪念、邪定？

胡志偉上述之所作所為，皆因理屈詞窮，未能理性地就事論事，非黔之驢莫屬！

中美體制異質與貿易戰

易憲容

（Confinement）。所謂的「接觸政策」就是接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讓中國參與各種國際事務，逐步成為分擔美國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所謂的「規鎖政策」是要規範中國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範圍以內。

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相比，「規鎖政策」不是通過孤立或隔絕等途徑等待目標國因內耗與低效而停滯以致崩潰，而是致力於運用綜合手段塑造目標國的發展路徑、鎖定目標國的發展空間。就此，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達得非常清楚。該報告開始將中國和俄國定義為競爭對手，而且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也刊出了對40年來中美外交關係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2018年第3-4期刊出了《中國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國願望落空》的文章，該文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來基於一種假設，即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越來越不符合美國政策訂立的預期，故美國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因此，美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並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該文刊出後，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界強烈反響和積極討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朝野上下形成了共識，即中國「精明地」利用了現有的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而佔了美國的「大便宜」，中美關係也開始進入質變期。也正是在這樣兩個大背景下，中美貿易戰要簡單地結束並非易事。

無關「修昔底德陷阱」

對於這場貿易戰的原因，目前市場主流的意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當前中美貿易關係不公平、不正常，因此，特朗普就得通過加徵關稅的方式來扭轉逆差，即所謂的「逆差說」，還有地緣政治說或「修昔底德陷阱」說。但是，這些主流意見都只能看到問題的表象，並沒有切到問題之核心。因為，對於「逆差說」，既有計算上的偏差問題，計算口徑不同，其貿易逆差差距會非常大；也有貿易逆差是否一定是不合理或貿易順差國一定是佔貿易逆差國的便宜的問題。因為，只要兩國發生貿易關係，不出現貿易逆差或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兩國的要素賦賦優勢不可能相同，問題在於兩國貿易關係是不是建立在比較公平的基礎上。因為，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經濟制度的差異很大、經濟結構不同、自然資源稟賦不同、金融市場制度及法律制度有差異，人民生活水平懸殊，正因為這樣，兩國貿易關係會存在更多的巨大資源優勢互補的合作空間，但同時，兩國之間

的貿易經常會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負向的外部性。如由於國家異質、本國偏好、市場分割、匯率錯調以及稅收扭曲和跨公司內部的轉移定價等，從而導致貿易的不公平或不對等，使得兩國貿易之間的一些爭端及摩擦不可避免。所以，中美貿易之間逆差及貿易摩擦是一種常態。

至於政治上的陰謀論或「地緣政治說」更是不成立的。因為，儘管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也達到美國的60%以上，但是一方面中國的GDP與美國GDP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貨幣意義上的可比性並不是實質內容的可比性，美國的GDP更多的是科技創新產品，中國的GDP更多的是傳統房地產價格上升，再加上2005年至2015年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因素（這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35%以上，由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8.27上升到6.14，對全球各國實質匯率升值52%以上），我們根本不用把中國GDP的內涵過分誇大。更不用與中國相比的是，美國不僅在軍事上有絕對優勢，而且還體現在教育、人口結構、科技、金融與法律制度及能源獨立等方面，在未來幾十年內，這種優勢難以改變。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如此之大，美國政府根本就不會在「修昔底德陷阱」上大做文章。所以，中國政府在這點上也十分明智，一直清醒地將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要努力學習發達國家發展自身。

中國要擴大市場化改革

所以，中美之間貿易衝突的實質上更應該是市場經濟體制與準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行為衝突，這種相衝突的經濟體制形成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在準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積極地參與和干預市場，由此導致了價格機制失靈或價格機制扭曲，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再加上兩國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及兩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的地位，使得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往往是結構性的，無法通過價格機制調整來解決，只能通過政策協調的方式來化解。而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美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是以美國利益優先，強調的是貿易公平性，而不是簡單的貿易平衡；中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注重的是讓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並希望以此來改變現有的包括貿易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所以，中美貿易衝突的政策協調空間又是非常有限的。這就必然導致兩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或貿易摩擦不可能避免，甚至於是一種常態。

既然中美貿易衝突是一種常態，兩國就得以平常心來看待。所以，對中國來說，要減少中美貿易中的衝突，還是要加大市場化改革的力度，讓中國的經濟體制更適應國際規則及市場法則。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否則，只能是守住小利而失去在這場全球化競爭中的大利。

國際視野

特朗普最近有點悶，原以為煮熟的鴨子又飛了。上次飛掉的是「特金會談」，這次飛掉的是美中貿易談判。

前些時候外界瘋傳，美中貿易談判接近達成協議，進入起草文本的階段，協定呼之欲出，似乎可以準備香檳酒了。卻不料5月10日傳來消息，談判再次擱淺，特朗普宣布美方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升至25%，而中方則採取反制措施，昨天宣布下月1日起，對已實施加徵關稅的600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率，分別實施25%、20%或10%加徵關稅。

貿易談判為什麼有如此逆轉？外界的說法是涉及重大原則問題，中方不能讓步。但這些說法令人產生疑慮：如果真有中方根本不能讓步的原則問題，何以談判能進行到收官階段？是中方不能讓步，還是不想現在讓步？

特朗普渴望連任

何謂「現在」？就是距離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只有一年，各位參選人陸續亮相，開場鑼鼓已經響起。除了貿易談判的戲，又增加了美國大選的戲，可謂「戲中有戲」。既然大戲拉開序幕，中方何必着急，不妨看看再說。

看什麼呢？當然是看特朗普。現在特朗普心底盤算的頭等大事，莫過於明年大選。對他來說，爭取連任不僅是權力之戰，也是名譽之戰，甚至生死之戰。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特朗普的總統寶座得來太突兀，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頗有點「倖進」的意思。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不是希拉莉大意失荊州，輪不到特朗普。最近出版的奧巴馬回憶錄，更是直截了當這樣說。這種輿論，很傷特朗普的自尊心。

特朗普這種心態，見諸於他在歷次演講，都把美國的問題歸咎於民主黨前任。譬如講中美貿易逆差，總少不了一句話：我不怪中國，只怪我的前任，是他們造成的問題。言外之意是，早讓我當總統就沒這些事了。因此，特朗普最渴望明年連任，以證明自己有能力當總統，而且是實至名歸的。

他更惱火的是，美國民主黨揪著「通俄門」不放，明指他的總統來路不正，還指控他妨礙司法，大有即使彈劾不成，也要秋後算帳之勢。這把達摩克利斯劍懸在特朗普的頭上，令他寢食不安。他上任後，指東打西，不斷製造國際事端，其動機之一是為了轉移國內視線，以圖自保。明年若能連任，他就可以再有四年化解危機，倘若其女兒或親信接班再幹幾年，那就徹底高枕無憂了。

因此，明年大選對於特朗普來說非常重要，勢在必得。為了達到目的，他要打幾張牌。首先是經濟牌，這幾年美國經濟情況向好，但功勞不能全算在特朗普頭上，奧巴馬有「前人栽樹」之功，如果進行總統競選辯論，特朗普只能與民主黨候選人平分秋色。

特朗普急於求成

另一張牌是朝鮮去核。特朗普與沖沖地跑到越南與小金會談，如能談成，有望拿個諾貝爾和平獎（當時已有入躍躍欲試為他提名了），更可以此力壓群雄，爭取連任。但他獅子口開得太大，小金拂袖而去，「火箭人」又開始發射火箭。這張牌成了臭牌。

最大的一張牌是中美貿易談判，若能談成，定是不世之功，既實惠又長臉，可以將以往十幾任總統一筆勾銷。憑著這份王牌，什麼希拉莉、拜登都不在話下，總統連任唾手可得。所以特朗普對這件事最為上心，對華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必欲取得這張王牌。

但特朗普作為商人，搞政治還是欠了火候，犯了三個大忌：一是要價太高，想一口吃成大胖子，但事情不像他想得那麼容易；二是做事不留餘地，頻頻以加稅相威脅，大玩邊緣手法，把對手逼到牆角；三是眼見協定可能達成，喜形於色，溢於言表，過早暴露意圖，讓對手看出了他的軟肋。

既然特朗普急於求成，中方何必急於成交呢？一則美國大選容尚未明，還有時間，何妨再等等，不到火候不揭鍋，不見兔子不撒鷹。二則談判就是交易，你漫天要價，我當然就地還錢。對特朗普這樣的商人總統，以商人規則應對才算合理。尤其是發現對方有所圖，誰不殺價誰就是傻瓜；就算你輕易讓了步，對方也瞧你不起。三則特朗普不是渴望競選連任嗎，這正是講價錢的時候，誰也別指望天上掉餡餅，平白撿個大便宜。投桃就要報李，當年特朗普參選有個「通俄門」，誰知道這次會不會又冒出個什麼「門」呢？

所以，就在美國輿論都認為談判破裂，特朗普暴跳如雷之時，中方卻好整以暇。劉鶴照舊西裝革履去華府，對記者說談判並未破裂，中方帶著誠意而來。而美方代表也不敢甩臉走人，反而笑臉相迎，同意繼續推進磋商。其潛台詞，就是還可以討價還價。什麼價？劉鶴提出的「三個核心關切」，就是中方的價碼，現在就看美方如何還價了。

長話短說

5月9日，林鄭月娥到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反對派議員多次就《逃犯條例》的修訂瘋狂叫囂、責問特首。當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命令逐出會場時，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竟大呼「林鄭下台」，甚至氣急敗壞地大聲辱罵「你唔死都有用啦八婆」。

如此喪失理智，充分表現了他黔驢技窮的笨拙本質。

衆所周知，各國或地區早就為罪犯訂立引渡條例，使逃犯難逃法網，亞洲如是，美歐也如是，這有利於各國或地區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近年來，一批批在外國的電話詐騙犯或貪贓犯從美、加、澳、東埔寨和非洲等國被押送回國受審，正是引渡條例的巨大法律

名家指點

中美第11輪貿易談判於美國華盛頓美國貿易代表辦事處舉行，5月10日開始第二日會議。路透社報道，中國副總理劉鶴在中午已離開會議場地。美國財長姆欽表示，談判有建設性。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啟動對餘下約325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的程序。在美國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上調關稅，中國亦宣布對600億美元美國商品提高加徵關稅稅率後，下一輪貿易戰還可能再打下去。現在的問題是，中美貿易談判一年多，最後結果怎麼會這樣呢？儘管兩國領導人的目的、意圖、期望會有很大不同，但這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可能最大問題還在於兩國的經濟體制不同，並由此引伸出目標、觀念、意識形態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無法通過這種短期談判來彌合的。

美對中實施規鎖政策

對於這場中美貿易衝突為什麼會發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目前衆說紛紜。不過，如果不能夠站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思考與研究，要找到根源，把握問題的實質並非易事。從近幾年全球各國的政治生態來看，為何具有極端民粹意識的政治人物紛紛當選？如美國、菲律賓、烏克蘭、意大利等都是如此。而這種現象出現很大程度上又與現代社會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社會精英聚集有關。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學家在《自然》雜誌上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表明，他們通過對遍布全球的63個考古遺址的考察，得出的結論是，從一萬年前開始，到晚期農耕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每次技術創新都使得人類財富差距拉大。這是一萬多年來的大趨勢。有研究者觀察到，這種趨勢在1780年前工業革命之後的140多年裏達到頂峰，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60年的時間裏，經過政策的調整，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總體上在不斷地下降。然而，上世紀80年代資訊時代到來，新一輪全球化發展，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又進入了持續上升的周期。所以，由於財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沒有分享到這一輪全球化及資訊化時代經濟成果的失意者也越來越多，他們需要尋求代理人來釋放壓力，改變現狀。可以說，特朗普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當選美國總統的。所以，特朗普上任以來所做的就是要改變這種現狀，讓更多的選民認同。特別是美國新的大選又要開始，如何讓美國選民認為特朗普正在改變這種現狀，當然是特朗普的第一政治要務。

同時，張宇燕等人認為，目前中美關係開始進入質變期。這種中美關係的質變可以概括為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Engagement）調整為「規鎖」